



浙江历史文化专题史系列

浙江民俗史

Zhejiang Minsushi

陈华文 等著

杭州出版社

浙江民俗史

陈华文 郑土有 宣炳善
徐吉军 李志庭 徐华龙
陈淑君 倪 敏 向焕星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民俗史/陈华文等著.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80758 - 021 - 8

I. 浙… II. 陈… III. 风俗习惯史—浙江省
IV. K892.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9718 号

浙江民俗史

陈华文 等著

本册责编 孟桂芳
封面设计 祁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社 址 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邮 编 310007 电话: 0571 - 87997719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440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8 - 021 - 8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 任：赵洪祝

副主任：夏宝龙 王国平 陈敏尔 巴音朝鲁

李 强 盛昌黎 张 曦

成 员：潘家玮 赵光君 马林云 沈立江

侯靖方 黄旭明 陈仲方 金兴盛

杨建新 俞剑明 陈永昊 万 斌

郑仓元 侯玉琪 徐 辉 胡祖光

许 江 王建满 王永昌 黄坤明

孙文友 徐止平 厉志海 张家盟

蔡 奇 楼阳生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歌平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

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孕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

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前 言

这是一部浙江这一区域的地方性民俗史。就我的学识所及，国内学界尚未有人做过这种以一省作为区域背景的地方性民俗史的研究，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同时也决定了我们的工作所具有的难度和开拓性意义。

一

钱塘江古称浙江、渐江，浙有弯曲之意，因此，钱塘江的下游称之江就因江之形态走势而来，所以，浙江省是因江而名。钱塘江主要流经浙江大地并将浙江一分为二，其北与西北是山地与平原，主要包括杭州、湖州和嘉兴三个地区，杭嘉湖平原就是浙江最大的平原。因杭州在钱塘江以西，所以历史上曾将以此地区为主要范围的区域称为浙西；而钱塘江以东则是丘陵和沿海的一些小平原地区，包括绍兴、宁波、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台州和舟山等地，历史上又曾被称为浙东。而将两者合称则为两浙，我们习惯上的浙江就包括上述两个主要区域。

从以江为名的事实来看，地理环境对于浙江的存在和浙江的文化形成有着突出的、显明的和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一点对于了解浙江文化的人来说，是一种常识。从远古时代开始，浙江文化就有着自身的起源和发展特征，而这种特征，应该说与浙江所处的地理环境紧密相关。温带季风型气候，湿润的空气和充沛的雨量，“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貌结构，紧临大陆腹地和面向大海的环境特点，决定了浙江文化在其起源和发展时期，完全依赖自身的环境优势，形成自己的特点。因此，在农业、渔猎等方面一向是大有作为，区域特色非常鲜明，并沿着这种特色不断地向前发展。今天浙江的深层文化结构依然与这种来之远古的文化创造有着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重农重商；开放创新；安土重迁。

重农重商是指浙江自古以来的农耕文化和商贸文化。定居的种植水稻农

业生产方式，不仅是浙江的主要生产方式，其在中国的出现或形成区域文化强势，与浙江源起的水稻种植农业生产方式是密不可分的。目前发现的有关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以及金华浦江上山文化遗址的种植水稻生产方式，就是最有力的明证。而进入封建社会之后的耕读传家儒家观念之所以在浙江生根开花，原因就在于它与数千年甚至上万年浙江的水稻种植生产方式完全相一致造成的。因此，从主流文化形态来看，浙江与全国其他区域一样，特别重视农业生产方式的传承和延续，农耕文化是其鲜明的特征。但浙江与其他区域又有着明显的差异。那就是浙江人不仅重农，而且还重商。进入两宋之后，由于与其他地域文化交流的频繁，相互之间比较的机会增加，人们对于浙江人善于经商的特点看得就特别清楚。明清之后，浙商在全国的影响则进一步显现，甚至走出国门大量开拓海外市场。重农重商使浙江与其他地方相比相对成为较为富裕的地方，这与居住于此的人民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勤快是分不开的。

开放创新是指浙江人敢为人先，创造和发展了区域特色文化。历史上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被注意到了浙江人的这种特点：他们与中原和其他区域的文化交流并善于吸收他们文化的长处，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在此基础上创新文化，从而使浙江文化在一定层面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以今天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处于高速发展之中，社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浙江人所具有的开放和创新精神。敢吃螃蟹，敢闯禁区，富于开拓精神，在新时期的浙江人身上从农业一直到工业再到金融业和服务业等各种行业中，表现出来。温州模式、义乌模式、浙江模式，成为近些年来全国改革开放学习的榜样。实际上，这些特征的形成，与浙江人所处的环境，尤其是面向大海的环境是分不开的。浙江精神实际上是浙江人在浙江这片大地上创造的，符合浙江人生存需要的，代代相传的生生不息的精神，他们敢于开放，敢于创新，敢于发展，一句话，他们从来没有止息自己的脚步，并以追求更加富裕、更加和谐、更加繁荣，也更加快乐的社会为己任，民俗便是表达他们核心文化的一种外化形态。

安土重迁是指浙江人对于传统农耕生产方式延伸的一种特别的价值观念。也许有人会以为浙江人的开放和创新，必定以离土离家为代价，实际上不尽然。对于占绝大多数的浙江人来说，农耕是他们赖以生存和延续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式，他们亲土、爱土、依靠土地生存，他们对于土地有着深深的挚爱和眷恋。他们表现出安土重迁，不愿离开自己生养的土地和家乡。从先

秦一直到明代以前，浙江基本上只有迁入的移民而很少有迁出的人口，就是明证。许多地方都流行“看不见某某就要哭”“三天看不见某某就要哭”等类型的谚语，说明人们对于故乡有着特别的执着。因此，即使有时迫于生计而不得不离开家乡，他们也强调落叶归根，晚年回归故里以颐养天年。安土重迁造就了浙江人特别的乡土观念和乡土文化，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那些在外地谋生的浙江人总是以抱团的形式一起做生意，从而造就了许多浙江村、浙江市场，它就是有力的证明。

当然，安土重迁也迟滞了浙江文化的转型，并使以农耕为主的文化长期地延续，对于现代社会也不能说完全就是一种好事。

浙江的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浙江民俗生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并因此造就浙江文化的特点；而浙江文化的特点，又在最大程度上制约着浙江民俗生活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并最终又反过来强化浙江文化的特点。浙江文化，尤其是浙江民俗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断地刺激和反复强化的基础上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从而特点鲜明，个性突出。

二

民俗是生活的文化，是一种约定俗成并得到民众认同，在某一个群体中存在和传承，对于生活方式起着规范和约束作用的文化。它在生存形态方面，首先是与区域地理环境总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仅是它的传承，也包括它的创造。它是为群体所认同，符合区域生活需要的文化。如以饮食为例，饮食首先由此区域的出产物所规定，而出产物则由此地的气候、地理等决定。高原没有办法种水稻这是人所共知的，反过来，江南地区若以放牧为主，也不符合环境的要求。环境与气候所决定的出产物，制约了某种饮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江南产稻米，形成了浙江人以饭稻羹鱼为主的饮食特点，而有关吃饭时所形成的礼节和习俗规定，也就以米饭为基准。“饭是有的，你一定要吃饱”便是浙江人待客时常说的一句客套话，虽然也许饭烧得并不多而菜倒是非常丰盛。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不仅以米饭为主食，而且以吃饱为最高标准。因此，当浙江人问“饭吃过了吗？”绝对是米饭而不会是面条。但在北方，诸如山西等地方，所问的则一定是面食而不是米饭。这就是区域之内民众创造并认同的文化，超越一定的区域，人们所表达的意义就会有分歧。

这种区域的民俗文化特点一旦形成，便会长期传承，成为某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而不断地得到加强。民俗在传承过程中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

于“自己的”认同并强化，人们总是强调这是我们的习俗，而将这种我们的习俗作为标准，用以衡量其他区域的习俗或文化存在，并将与我们不同的归类到异文化或奇风异俗。于是，当一种文化得到民众的认同而成为群体的标志或习俗之后，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于这种文化存在的不断地强化以示与其他区域文化的差异和区别。这一点，当我们考察民俗发展的历史时，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例如，进入宋代之后，婚姻缔结过程中使用花轿作为交通工具。在浙江，这种交通工具被不断地强化和艺术化，所制造的花轿不仅花样百出，而且造型和工艺是越来越高，融入的传统文化和浙江文化特点是越来越突出。婚姻过程中在浙江几乎全境都存在的十里红妆，便具有这种强化文化形态以获得群体认同的特点。

这些特点的形成，最终对于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人都形成规范和约束的作用。今天有的民俗学家特别强调民俗的规约性，即它作为“规矩”的作用，原因就在于此。规范使每一个生活于此的人在文化价值观念指向上趋于一致，于是在道德伦理和标准的评判上，地区性的意义就非常突出。而约束力的形成，也同样在强化着这种一致性。可以这样说，正是习俗的规范和约束作用，使浙江人成为浙江人并且与其他地方的人区别开来，同时在文化的交往过程中，让其他地方的人感受到浙江人的精明、能干、细腻等特点，用不太爱听的语言则是花花肠子特别多。

浙江的民俗就是这样一种对于浙江人有着不可抗拒的影响和塑造意义的文化，他们从浙江每一个个体一出生就对生存于其中的每一个人产生影响，在杭州，成为浙江的杭州人，在宁波成为浙江的宁波人，在温州成为浙江的温州人，而在金华则成为浙江的金华人，一句话，成为一个浙江不同地区认同的浙江人。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浙江不同地区的语言成为他们文化认同的语言，浙江不同地区的习俗成为他们文化认同的习俗，浙江不同地区的饮食成为他们文化认同的饮食，而浙江不同地区的信仰则成为他们文化认同的信仰。而这些的长期存在，则不仅构成了浙江民俗的整体性，也构成了浙江民俗的历史。我们的研究对象便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的对于浙江人的生活和具有决定性影响、塑造的民俗存在。

毋庸置疑，这种文化在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历史过程中，由于与浙江人相伴生而存在从而也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宝贵的文化财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如何看待、对待这种文化，就成为今天在文化转型和急剧变化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标杆。

三

人是文化的动物。换句话说，从文化一经创造出来之后，人与动物的区别也就有了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文化出现的民俗，几乎是最古老也是最代表一个地方文化的东西，它与作为“人”这一与动物区别的标准同时出现，因此，民俗的出现几乎伴生于人类的最早期和整个过程，应该是没有错的。

为此，虽然在原始社会时期还没有浙江这一区域性概念和特征性文化的形成，我们的民俗史依然从原始社会开始。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原始社会对于人类的存在，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但我们对它的记录几乎是零，而我们对它的了解也同样非常有限。如果说，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原始时期大都是一种假设，那么，我们对于浙江的原始社会时期的文化便是在社会分期假设的基础上对于浙江这片土地上有关考古文化的一种推断，民俗文化是这种推断基础上的假设和其他文化相印证的研究。但这是有着一定科学意义的推断和假设，因为，浙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等，在一个相对时期变化是有限的。生存环境变化的有限性和创造工具等的有限性，构成了浙江民俗文化变化的有限性和稳定性。而进入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之后，浙江开始与主流的中原文化交往，有关文化形态也不时出现于有文字记载的中原文化系统中，甚至在魏晋南北朝之后，浙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另外一个中心，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主流，并最终完全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而成为其最有代表性和区域性意义的一种地方文化。

从文字的记录来看，浙江文化被中原衣冠群体所接受，是在他们生活的家园出现内乱而被迫迁入蛮荒之地的浙江之后，他们将自视为上层文化的中原儒家文化和相关的政治制度随着政权的迁入而带入浙江等地，并在随后的历史过程中，为浙江等南方省份所接纳，甚至发扬光大。可以肯定，浙江的民间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上层文化的冲击并发生变化，而中原的上层文化也在进入浙江等地之后，开始为了适应此地的原有文化而变革或消融异化。浙江人从西周开始就崇尚的中原礼义文化，在浙江人所具有的开放创新和兼容并蓄的精神之下，逐渐成为这一地区新的文化模式和样板。进入有宋之后，尤其是进入南宋之后，历史再一次将南北文化融合的机会，主要交给了浙江这一地区来完成。在临安作为宋朝的都城之后，由于大量不同地区的人员进出或迁入，使它不仅成为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大都市，而且也成为南北文化交融的首选之地。从今天依然保持着的有着半官话性质的杭州话，可以

想见当年北方军政人员和民众迁入浙江，尤其是杭州之后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我们相信民间文化首先创造于民间，它服务于民间生活。但这不等于它与上层文化是隔绝的。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独特的科举制度，士庶之间以及它们的转化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平民包括读书人，一朝中举，迅速可以将身份转化为士或仕，他们可以从平民迅速成为官员，进入另一个阶层。而下层文化也因此迅速地成长为上层文化。当然，由于他们的归隐或致仕，也会将上层文化带入民间。这种文化之间的转换没有界限，有时也很难将其融合变异简单地加以区分。但上层文化与下层平民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则非常明显是存在的。中原衣冠进入浙江等地之后，加速了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交融的同时，也加速了上层文化与本地下层文化的交融。从今天浙江等地有关丧葬与婚姻习俗中特别讲究所谓的习俗规定，我们可以感受到礼制等上层文化对于民间文化的影响。当然，下层文化也并不会一成不变地照搬上层文化，那些停丧讲仪式但又根据民间的理解用热闹的方式闹丧等的形态，非常明显就来自于民间对于死亡文化的理解。浙江民俗发展史贯穿了这种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交融互动的历史。

不仅主流文化对于浙江民俗的存在产生影响，其他民族或地区的文化也对浙江的民俗存在产生影响，如元代时的有关蒙古族的文化、清代时的有关满族的文化，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习俗内容方面，对于浙江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进入民国之后，也随着民族情绪和政权更替之后的革命需要，有关旧的习俗被大量的革除。然而，非常有意思，它不是对民族旧文化的清算，它仅仅是对于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旧习俗进行变革或改造。如对于裹小脚习俗，便是全部革除，而对于留辫与剃青，则进行了改造。留青而剪辫，并受到西方头饰文化的巨大影响。可以这样说，一部浙江民俗史的发展历程，既充满了浙江人的创造，也拥有浙江人的学习模仿，既有交融互动，也有对其他区域的影响和输出。

四

民俗是一种文化，但它又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一种生成于民间，存在于民间，并为民间的生活服务的文化。它大都以行为的方式存在于某一些特殊的群体之中，有时则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代代相传。它没有文字，它也不屑于或不用文字去记载，因为传承就是最好的记录。因此，要研究这样一种创造于民间又生存于民间的文化，如果仅仅从现实角度，调查是一种获得资料的

最好的方法。

问题是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文化的历史：因为它属于生活，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意，于是即使掌握了文字运用能力的人，也不会进行有意的记录，这就更导致了文字记载的匮乏。除了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散落于史籍之外，专门性的著作几乎不存在。面对这样一种历史，对于研究者来说，一是描述民俗历史存在的难度大大地增加，二是梳理民俗历史材料的难度大大地增加，三是建构区域历史发展的难度大大地增加。浙江民俗史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从官方的历史中寻找民间生活存在的蛛丝马迹；二是从地方资料中寻找民俗存在的材料；三是从官方反对或禁止的条文中推断当时民间可能的另一种存在；四是从目前调查的现实中印证历史上可能的存在。但这几种方法在运用时，都必须特别小心，以免因为个人的武断而导致虚构历史、曲解历史。因此，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找出民间生活方式存在的民俗材料，并对当时的地方区域民俗生活进行重建，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而现在我们的尝试成果就摆在大家的面前，任由大家评判。但是，我还是要说，浙江民俗史，在下述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

1. 第一次系统地梳理和建构了浙江这一独特区域的民众在历史过程中生活的形态和内容。也许我们从前重视的是在浙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这固然重要。但实际上，对于每一个生活于不同时期的浙江民众来说，细节性的民俗，才是最重要的。它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决定浙江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性格。因此，这种研究应该完全是全新的。

2. 仅仅从生活角度而不是制度角度来审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浙江地方文化和生活文化。《浙江民俗史》虽然也有从礼制材料入手的，但它仅仅是作为对于理解当时环境下人们生活的对立面或参照而存在，我们从大量的历史材料中寻找一直被上层文化忽略的生活细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浙江地方生活，尤其是浙江民俗生活的历史。

3. 突出文化的互动性。整部《浙江民俗史》在很大程度上都注意上层文化与生活文化的互动、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的互动及不同民族间文化的互动。我们相信，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文化相互间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传播，因此，著作中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同时，我们也没有忽视地方创造的意义，将互动与创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4. 强调区域影响的同时，也强调政府对地方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这种影响都存在，而在民国时期，这种影响表现得尤其明

显。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对于自上而下的这种对民俗生活的影响，始终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来对待。

而同时，浙江民俗史在下述方面具有创新意义和价值：

第一，这是第一部以省级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史研究著作，开创了民俗史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模式和视角。从目前可知的民俗史研究情况来看，对于汉民族或中华民族整体民俗史研究的著作包括对于民俗学研究史的著作，已经出版了数部，甚至有多卷本的民俗通史一类的著作。但从区域，尤其是从一个省级建置的区域对于其整个历史过程进行民俗发生、发展的研究，这应该说是第一部。因此，不仅对于浙江的区域生活我们从整体和区域出发进行独特视角的观察和叙述整理具有特别意义，而且，也使我们的民俗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微观观察和整理的时代，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应该是不容忽视的。

第二，通过对浙江民俗历史梳理和审视，使我们更全面也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浙江民众在区域中的生存方式和根据自己的环境所创造的独特的文化形态。我们知道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与区域环境之间的关系，但我们常常又没有进入一个非常微观的世界去观察这种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浙江民俗史的研究，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观察的窗口：浙江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活需要，创造属于与这一地区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尤其是民俗文化形态，像舟楫文化、渔猎文化和一些独特的信仰文化等，这在中原以及其他许多区域都不曾出现过，也不需要存在，原因就在于那些地区没有这类文化生存的环境。

第三，通过浙江民俗史的研究，使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浙江区域民俗与汉民族其他地方民俗和文化的互动、交融和相互影响，而一国之民俗史实际上是由各个不同区域的具体民俗所组成。当我们强调环境的意义时，同时又不能忽略主流文化对于浙江这个处于中心文化边缘地区的相关文化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现实。实际上，从秦汉开始，甚至更早的时候，浙江的区域文化就受到中原等地区文化的影响，断发文身一类逐渐退出这一地区文化的事实，便是明证。东晋南北朝之后，这种影响更加直接和巨大，以至改变了浙江文化的“异”文化形态，并获得汉民族核心文化的认可；而在其存在和发展过程中，也对主流文化或周边地区的文化形成互动的影响，对于民俗文化的多元性和一体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目 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习近平	(1)
前 言	(1)
第一章 概述	(1)
第一节 浙江的地理区位概述	(1)
一、浙江的地理位置	(1)
二、浙江行政区划及其历史演变	(3)
三、浙江的区域地理特征	(6)
四、地理环境对民俗文化存在的意义	(8)
第二节 中国民俗格局中的浙江民俗	(11)
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民俗结构	(11)
二、吴越文化背景下的浙江民俗	(13)
三、开放与发展：兼收并蓄与自我生存	(19)
第三节 浙江民俗史的演变轨迹及其特点	(23)
一、浙江民俗史的演变及其分期	(23)
二、浙江民俗发展的特点	(26)
第二章 独立发展：史前浙江民俗	(33)
第一节 浙江史前的文化遗址和类型	(33)
一、旧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	(33)
二、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	(34)
第二节 浙江史前民俗的发展演变与主要形态	(40)
一、以水稻种植为主、渔猎为辅的生产习俗	(40)
二、饮食习俗	(46)
三、居住习俗	(49)
四、衣饰习俗	(53)

五、丧葬习俗	(55)
六、信仰习俗	(58)
第三章 吴越交融：先秦浙江民俗	(64)
第一节 吴与越的文化渊源	(64)
一、越文化的渊源	(65)
二、吴文化的渊源	(67)
三、吴越文化的融合	(71)
第二节 越文化及其民俗形态	(72)
一、独特的“鸟语”与语言习俗	(72)
二、“火耕水耨”与“饭稻羹鱼”的生产生活习俗	(74)
三、善舟楫的交通习俗	(76)
四、“越剑”与先进的冶炼铸造技术	(77)
五、“断发文身”与越人的衣饰习俗	(78)
六、“重神信巫”与信仰习俗	(81)
第三节 越民俗对区域文化的影响	(82)
一、对吴地民俗文化的影响	(83)
二、对中原文化与民俗的影响	(84)
三、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85)
四、对海外的影响	(86)
第四章 汉越共存：秦汉时期浙江民俗	(90)
第一节 中原视野中的浙江越民族及其区域生产方式	(90)
一、秦汉时期的浙江地区的越民族	(90)
二、地域特色的生产方式	(92)
第二节 秦汉浙江越民族民俗的基本特征	(96)
一、鸟信仰崇拜	(96)
二、防风的地方神崇拜	(96)
三、东阳郡越人斗牛	(97)
四、断发文身	(101)
五、吴越铜剑与铜镜	(104)
六、善用舟	(104)
七、越人歌	(105)
八、不合中原伦理的越俗婚姻	(106)
第三节 秦汉时期浙江越族社会伦理的汉化趋势	(108)